



跨越代沟

7.25

和青年朋友谈诗·公刘

责任编辑 刘明达
封面设计 贾 愚

跨越“代沟”

——和青年朋友谈诗

公刘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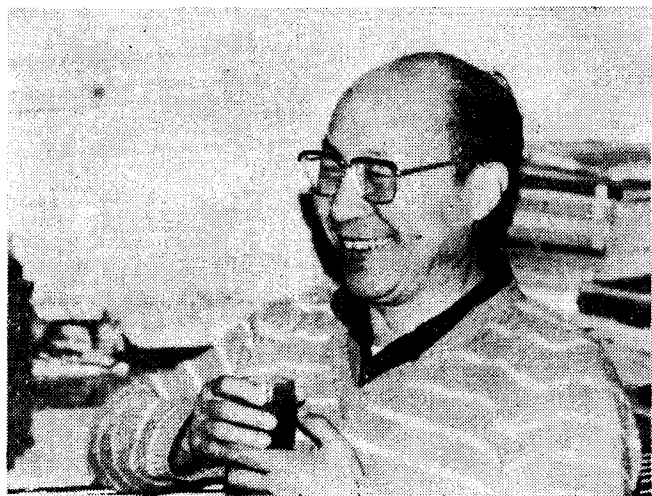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70,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0

ISBN 7-5396-0037-3/1·38 定价：0.75元



公 刘近影

(孙建三摄)

目 录

小 序.....(1)

新的课题.....(5)

顾城一首：生命幻想曲

读《对衰老的回答》.....(18)

周涛一首：对衰老的回答

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28)

陈所巨三首：在农村公共汽车上

我不能再象你们

阳光 土地 人

喜读李钢新作.....(72)

李钢三首：老兵箴言录

水兵日记

蓝水兵

徐明德和他的诗.....(82)

徐明德两首：我站了一千公里

祖国，我没有学历

简评《谒包公祠》……………(90)

张承信一首：谒包公祠

三首不怕死的歌……………(101)

贺东久三首：夜思

他曾是地主的后裔

以各自不同的姿势，倒卧

三支唱故乡的歌……………(109)

培贵三首：深巷的回想

童年记事

那棵黄桷树

多写一点朗诵诗吧……………(119)

陈寿星一首：我们走过广场

这个红芋确实烫手……………(127)

梁如云一首：一个烫手的红芋

小 序

作诗固然难，论诗也不易。汗牛充栋的历代“诗话”当中，立论精当者令人拍案叫绝，千载之下被后代引为知音；执着偏颇者令人扼腕不已，想不通何以会得出如此观感；至于那些等而下之，出洋相，闹笑话的，就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讥笑嘲骂的对象了。我以为，这样三种不同的结局，实在是公允合理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蒺藜的就活该得藜藜。

平日间，我自己爱写诗，因此也爱读别人写的诗。同样，我自己也爱发一点议论，因此也爱读别人发的议论。相比较下来，我更喜欢读那些诗人们写的诗歌理论和诗歌评论。这也许是一种偏爱；所幸，我依然拜读理论专家们、权威们的大块文章，只要你说得对，我也一概赞扬，由是而并未形成偏废。我之所以更喜欢前者，那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有实践的感受，酸甜苦辣，辨得分明，说得痛切。这正是所谓有识。假若还能做到摒弃四平八稳，面面

俱到的“正确”胜券，而宁愿选择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的风险道路，那就是所谓有胆；在下就尤其钦佩了。

无可讳言，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有胆有识的诗歌理论文章和诗歌评论文章，并不多见，因此而引起了青年同志们的强烈不满。偶有一篇，就必然聚讼纷纭，多数的普通读者倾注着极大的兴趣，少数的不普通读者或者自认为不普通读者却投以斜视的目光。

即使是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上述现象，对我们也并不陌生。

而且，这一个“无可讳言”又带来了另一个“无可讳言”，即：到底什么诗算为好诗？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大致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的标准？一系列问题，迄今似乎还在争论之中，也就是说，迄今依旧是一片浑沌，有待澄清。

今年五月份，在由《华夏诗报》担任东道主的第二届全国诗刊诗报协作会上，蒙莅临会议的“各路诸侯”不弃，要我对他们各家的出版物一一评点之余，顺便谈一谈个人对于何谓好诗的意见。我虽惶恐，但不敢拂逆，只得遵命。

我是这么理解的，一首好诗，应该具备五条：

一、有骨头，独行其是；二、有脑袋，独立思考；三、有灵气，独具慧眼；四、有创造，独自开拓；五、有个性，独家色彩。这五条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便得不到满分。无疑，这是一个严格的标准，大诗人也未必每一首都能达到。因之，与其绝对化，不如相对化，我们在取舍品评中毋宁采取比较级，而不要（事实上也不能）坚持最高级。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比较是有界限的，不应当模糊了甚至泯灭了各个层次上的比较与最高视标的远近不同的距离感。

以上，便是我的答复——一家之言。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美意，嘱我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写的部分推荐新人的评论文章，整理汇集，并且配上他们的某一篇或者若干篇佳作，印一个小册子；目的在于帮助广大的诗歌爱好者得到一点参考。

于是，我挑选了十篇，另外，把被评论对象的有关作品（不一定是代表作）搜罗了十九首，作为附录，供阅读时对照；点头摇头，悉听尊便。

我的挑选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专题研究不收，札记随笔也不收；被评者当时便成了名的不收，虽然当时尚未成名，但纯属为他或他们的一个诗集而

写的序文也不收。举个例说，《新的课题》发表时，诗坛还似乎不了解顾城同志何许人也；再举个例说，《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完稿之际，正当陈所巨同志面临困惑，需要有人给他鼓励，争取新的突破之日。同时，我写这些文章，虽然笔下只谈一个，心中往往却是一群。《新的课题》绝不是为了替一个青年诗人顾城同志开路，而是要求解放一大批诗的生产力；同样，《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也不仅仅是为陈所巨同志呼吁，而是意在为整个儿的农村题材、农村生活诗歌的未来寻求一条更为宽阔的出路。

自然，上述的解释纯粹是主观愿望和主观认识，究竟达到了没有？实现了多少？只能由公正的读者裁断。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辑入这本小册子的十篇文章，有一部分是曾经为别的诗论集收录过的；再一次选用，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得到理解。

1986.6.24.合肥

新的课题

——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最近，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出版的《蒲公英》小报上，读到了一组诗：《无名的小花》。作者顾城同志在小序中这样写道：

《无名的小花》长久以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随父“下放”少年的畸形心理……

当然，随着一个时代沉入历史的地层，《无名的小花》也变成了脉纹淡薄的近代化石。我珍视它、保存它，并不是为了追怀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给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一点论据，让他们证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地。

这一段内心独白似的言语，使我感到颤栗！
于是，我设法找来了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的全

部诗作，默默地读着，也默默地想着——

粉碎“四人帮”以来，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一批新人，戏剧和电影创作方面也开始在出现，唯独诗坛没有多少别开生面的变化。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由于我们的青年一代中缺乏时代的歌手么？显然不是的。《天安门诗抄》的群众作者就多数是青年人，他们写下了已有定评的传世之作。即以现今北京街头张贴的某些油印刊物为例，我看，其中也不乏诗才。

有的同志也承认，这些刊物中的某些作品闪烁着一种陌生的奇异的光芒，但又断言，这些作者是走在一条危险的小路上。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评论。我想，从诗贵创新的角度看，我们自己每写一首诗，不也同样是对思想感情领域的一次“探险”么？既要“探险”，就不免冒险，就必须另辟蹊径，就不能老是重复别人的脚印。

还有人说，这一类新人新作，不过是一些个人主义的呻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回声；这恐怕也是过于简单的否定吧，不敢苟同。是的，我们如果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往往很容易把本来是上升运动的螺旋错当成周而复始的圆圈。事实上是：历史毕竟不会重演，尽管它

们有时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和世界了，这是大家都能看得明白的。因此，即或这些诗作中有着消极的甚至是颓废的一面，但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因素，也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有不少文章曾经公正地指出，新一代是思索的一代。思索，我以为，这的确是抓住了一代人的主要特征。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光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上面引用的小诗是顾城同志在一九六八年写的，当时，林彪和“四人帮”及其高级顾问的倒行逆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作者年仅十二岁。我并不觉得这首诗特别精彩，但它的确说明了一个历史的客观过程：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狂热逐渐冷却了，各地武斗升级，血泪成河，所有佩戴过或者羡慕过红卫兵袖章的孩子们开始进入了生活的新阶段：思索。一叶知秋，这就是一叶，

接下来我们大家便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遇见过这么一个小男孩，他独自一人在荒凉的河滩上踽踽而行，他不时望望昏黄的空天，怨恨着为什么要刮这么大的西北风，而瘦小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瑟缩起来；忽然，他又天真地一笑，希望西北风刮得更猛烈，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拾到更多的枯枝；他的那个新近迁来的下放人员的家，喘息着的灶火正在等待着柴草。这个小男孩酷爱读书，但偏偏命运把他从文化的伊甸园中放逐出来，仿佛他偷吃了什么禁果，犯了什么罪。此刻，他只好抱定“抄家”的劫后余灰——一部《辞海》，象还不习惯吃草的小牛犊那样咀嚼和反刍着。他的一切权利（包括受正常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唯一剩下的只有任谁也剥夺不掉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象千万个男孩子女孩子一样，顾城在幻想中长

大了。缺乏物质的乳汁(精神产品的物质形态是书、画、音乐和表演，还有旅行和各种交流等等)，仅有幻想的乳汁，又怎么能不导致病态的早熟？他写了一首题名《生命幻想曲》的诗，由衷赞美了大自然、太阳、月亮、大地和谷物，表露了积郁在这颗年幼的心灵中的对祖国对人类的无尽的爱。它使我惊异，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虽然，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可以争议的。

幻想是现实的折光。有时，幻想象一位魔术师，的确能变化出色彩斑斓的东西来。然而，人毕竟不能通过万花筒看世界。结果，幻想也终不免掺进去了对于现实的辛辣讽刺。浪漫主义一个斛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从现实中腾空而起，也不能不落回现实中来。于是，在他的一首描写村野之夜的小诗中，竟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句子：

我们小小的茅屋，
成了月宫的邻居，
去喝一杯桂花茶吧，
顺便问问户口问题。

历史在迂回曲折中前进。在它的某一阶段，往

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逆流冒名顶替了主流，而真正的革命大潮却被斥为“妖风恶浪”。处在这种反常的氛围之中，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应该怎么办？有的堕落了，当了“白卷先生”一类的“当代英雄”；有一小部分则扎扎实实深入到人民中去，如同蚯蚓之于土壤；但大多数人都因为“既不能前进，又不愿后退”（《幻想与梦》），只好象顾城那样，以《铭言》自勉：

且把搁浅当作宝贵的小憩，
也不要随浪逐波。

宁愿“搁浅”，这在奋发有为的年华，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啊！我的前辈们固然有更多的动人的跑步投入战斗的故事，这有待他们自己去叙述。就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来和新的一代作比较，也不难指出：我是在四十年代后期，被席卷蒋管区的学生运动（这是当时全中国的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带进红色的队伍中来的。我们要民主、要科学，当然就要打倒反民主、反科学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目标是清晰的，斗争是

义无反顾的。然而，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代，都是在红旗下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地主和资本家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魔鬼。一方面，要民主、要科学的历史任务尚待完成；一方面，他们又懂得，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因为谁都知道，从本质上讲，马列主义正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更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见的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而不幸客观存在着的，却是被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把这一切都搞乱了、破坏了的痛心的事实。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与革命理想的界限。更多的青年则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彷徨了，有的甚至走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

顾城同志大致属于这一群，唯其如此，字里行间也就每多愤世嫉俗之言。例如，他有一首题名《两个情场》的诗，这样写道：

在那边，
权力爱慕金币，

在这边，
金币追求权力，
可人民呢？
人民，
却总是它们定情的赠礼。

这里有很大的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这种片面性的，是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政治气候的异常，这是不能过多去责难青年们的。

众所周知，在人们的一生中，青少年时代可塑性最强。他们虽然被极左路线扭曲了，可是我们不能嫌弃他们，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同他们一道努力，把扭曲了的部分一一加以矫正。如果回到顾城同志使用过的“搁浅”的比喻上去的话，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拉纤、撑篙，或者跳下水去用肩膀将这些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我们要消除他们的怀疑和误解，指出国家经过艰苦的奋斗肯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被玷污了的革命传统平反昭雪才是最大的平反昭雪，为被败坏了的社会主义恢复名誉才是最根本的恢复名誉。

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这些新的所谓不见经传的诗歌作者，他们的悲欢是和人民群众的悲欢熔铸